

当保守遭遇民粹：高市早苗冲击与日本外交失衡

张 勇

摘要 在民粹主义的暗流涌动中，被视为“女版安倍”和“保守强硬派”的高市早苗上台执政，昭示了日本保守政治的加速右倾化。民粹势力、党内权力结构及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深度影响新政权运营。高市政权右倾化日益凸显，同时其又试图利用民粹主义的能量，冲击效应已现端倪。随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踩刹车”作用的公明党的离去，高市领导的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成了“双油门”的联合政权。在延续“安倍路线”的前提下，日本内外政策将带有鲜明的“高市特色”。即便“美国优先”与“日本优先”时有摩擦，日本仍将日美同盟视为战略之锚。此外，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高市政权对美与对华政策严重失衡。高市及其外交安保团队将继续掏空乃至修改《日本国宪法》，提前修订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甚至试图挑战“无核三原则”，图谋实现日美“核共享”，加速打造能战国家，实质性强化对华威慑。在中日关系上，受民粹裹挟的排外主义情绪催生“公民安全”这一外交新课题。高市将所谓“台湾有事”与行使集体自卫权挂钩，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其涉台错误言行极不负责、极其危险，正给中日关系和地区和平带来严峻挑战。

关键词 高市早苗 “安倍路线” 民粹主义 日美同盟 中日关系

* 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7）。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知的数据库建设及对华战略和行为研究”（项目编号：24&ZD3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5 年 10 月 21 日，高市早苗成为日本内阁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内阁支持率呈现“高开”局面。她身上标签众多，舆论尤为关注的是“女版安倍”和“高市特色”，前者源于她自视为前首相安倍晋三^①的继承者，后者则凸显其在政治立场上的保守强硬色彩。

高市首相的执政代表着日本保守政治的加速右倾化，同时其又试图利用日本国内既有及舶来的各路民粹势力。同以“吉田路线”为代表的“保守本流”相比，传统保守思潮已发展至异化的阶段。当保守遭遇民粹，日本保守政治的异化将如何演变、民粹幽灵以何种方式渗入日本政治，以及二者叠加下的高市政权又以何种姿态开展日本外交，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日本自身抉择，其影响亦将波及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高市虽执政不久，但其冲击力特别是负能量却备受关注。日本的极右派利用民粹主义兴风作浪，正对日本国内与国际秩序形成深刻挑战，并带来诸多失衡：一定程度上起到“踩刹车”作用的公明党愤然离去，高市领导的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成了“双油门”的联合政权；强化日美同盟与开展对华外交严重失衡，且有不断加剧之势；在对华关系上，偏重威慑而轻视协调。尤其是，11 月 7 日，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答辩时妄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意欲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公然展开对华威慑。“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信弃义，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②这一言论“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战略走向的担忧，其负面影响已开始波及日本经济社会”。^③围绕高市早苗上台带来的巨大冲击，作者深感极有必要从学理层面进行系统的讨论，归纳日本时局急剧变动背后的行为根源与发展逻辑。^④

① 作者曾对高市早苗首相的政治导师安倍晋三的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进行过学术探讨，详见张勇：《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外交评论》，2017 年第 6 期。

② 《钟声：绝不容忍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越线挑衅》，《人民日报》，2025 年 11 月 14 日，第 3 版。

③ 《钟声：一意孤行抑或回归理性，日本再次面临抉择》，《人民日报》，2025 年 11 月 22 日，第 3 版。

④ 高市上台也引发中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 10 月 21 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外交研究室在高市即将上台的背景下，举办了以“共性与差异：区域国别视阈下的排外主义思潮”为题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的学者，聚焦日本、欧洲、非洲、印度、东南亚、俄罗斯、韩国等多区域典型案例，通过跨区域对话与比较研究，探讨了排外主义思潮的区域特征、互动关联及其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的深层影响。

一、保守遭遇民粹：从参院选举到高市上台

关于民粹主义兴起的研究视角，国内外学者已针对不同的情境、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作为近年来政治学研究中频繁使用的热词，民粹主义既充满争议，又备受关注，由此带来如何切入和怎样定义这两个问题。关于如何切入，我们要区分不同的情境，如其在任何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和地区以不同形式呈现，涵盖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政治表达风格和政治策略等诸要素。关于怎样定义民粹主义，学界已有诸多讨论，但概念上的含混甚至带来了理解上的混乱。简而言之，民粹主义是关于“人民”的主义，它将世界划分为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认为政治应当是人民意志的表达，人民性通常被视作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除此之外，攻击精英和排斥外部群体也被视为民粹主义的两大要件。^①

21世纪的世界仿佛迎来了民粹主义时代，如今，民粹主义的浪潮是否也深度影响了日本政治？2025年7月20日，日本政坛遭受强烈震荡，成立仅五年、因提出“日本优先”等主张而被多方批评为排外主义的参政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实现了重大突破。针对该党的批评至今未息，足见围绕其立场的党派对立之激烈，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鸿沟已难以弥合。^② 参政党强化本土产业、限制移民的主张引发社会忧虑，日本是否正涌动着排外主义浪潮？民族主义政治影响力是否急剧扩张？这一现象迫使各界重新审视社会包容性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日本言论重镇《中央公论》聚焦变局推出特辑，从政治思想及其内外影响的角度考察了日本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化，指出需要参照战后思想脉络与海外案例来思索未来方向。例如，东京大学教授苅部直与社会构想大学院大学教授先崎彰容，共同探讨了如何在规避排外主义的前提下重塑日本自我形象；^③ 一桥大学教授安藤馨借助法哲学理论剖析了福

^① 相关内容参见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9, No. 4, 2004, p. 543;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大嶽秀夫『日本型ポピュリズム—政治への期待と幻滅—』、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118—119頁；堀江孝司「『人気取り』の政治—日本の国会における『ポピュリズム』の用法と批判の論理」、『人文學報』2022年3月号（518-3）、41—71頁；林红：《潮起潮落：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25年，第2页；田野：《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8页。

^② 参见善教将大『民度一分極化時代の日本の民主主義—』、中央公論新社、2025年。

^③ 苅部直・先崎彰容「対談『極右ポピュリズム』への处方箋 排外主義に陥らず日本の自画像を描くには」、『中央公論』2025年第11号、86—95頁。

利国家的伦理逻辑，揭示“日本优先”的实质；^① 早稻田大学教授田边俊介基于持续调查，针对民族主义在当今日本是否高涨这一问题，厘清了四种类型；^② 千叶大学教授水岛治郎则基于欧洲经验探讨了“福利排外主义”与宗教身份认同问题。^③ 除此之外，自民党众议院议员齐藤健与中央大学教授中北浩尔就组织的弱化、治理、新兴政党的崛起等议题，回答了建党 70 年的自民党能否重生之问。在面临民粹主义压力的问题上，当今日本政治与欧洲的情况颇为相似，即不应对民粹主义，就无法赢得选举，日本也将进入这样的时代。^④ 在当今日本，民粹主义往往被解释为“大众迎合主义”或“人气政治”。^⑤ 日本学者曾针对长期执政的小泉纯一郎政权进行过专门的探讨，聚焦于小泉的执政风格及内阁支持率问题。^⑥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桥下彻领导的日本维新会在 2012 年的选举中严厉批评自民党和民主党并取得跃进。虽然其在 2015 年关于是否支持“大阪都”构想的居民投票中败北，桥下随即退出政界，但以大阪为中心，维新会至今仍具有较强的存在感，^⑦ 直至此次与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携手联合执政，其身上的标签之一即为“财政民粹”。^⑧ 必须指出的是，民粹主义带有鲜明的“利用选民对政府的憎恶情感”进行“精英内部的竞争”的色彩。民粹主义政客“与他们想取代的当权者有着相同的背景与教育”，是精英阶层中的“激进分子”。^⑨

日本政治学者大岳秀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深刻指出，长期的经济低迷，使日本的经济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体系面临根本性重构的课题，导致日本民众对强势领导人的期待不断高涨。^⑩ 近年来，日本参政党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为回应民众期待的政治领导力量，在 2025 年的参议院选举中紧抓大众舆论的

① 安藤馨「福祉国家を支える論理と倫理『日本人ファースト』を法哲学で考える」、『中央公論』2025 年第 11 号、96—103 頁。

② 田边俊介「本当に高揚するのか？継続調査で見えたナショナリズムの 4 類型」、『中央公論』2025 年第 11 号、104—111 頁。

③ 水島治郎「先行するヨーロッパから何が見えるか—福祉排外主義と宗教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中央公論』2025 年第 11 号、112—119 頁。

④ 齊藤健・中北浩爾「〔対談〕組織の弱体化、ガバナンス、新興政党の台頭……結党から 70 年、自民党は再生できるか」、『中央公論』2025 年第 11 号、120—129 頁。

⑤ 参见水島治郎『ポピュリズムとは何か—民主主義の敵か、改革の希望か—』、中央公論新社、2016 年。

⑥ 代表性成果参见大嶽秀夫『日本型ポピュリズム—政治への期待と幻滅—』、大嶽秀夫『小泉純一郎 ポピュリズムの研究—その戦略と手法—』、東洋経済新報社、2006 年。

⑦ 水島治郎『ポピュリズムとは何か—民主主義の敵か、改革の希望か—』、はじめにⅢ 頁。

⑧ 参见吉弘憲介『検証 大阪維新の会—「財政ポピュリズム」の正体—』、筑摩書房、2024 年。

⑨ 埃德蒙·福西特：《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杨涛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373—374 页。

⑩ 大嶽秀夫『日本政治の対立軸—93 年以降の政界再編の中で—』、中央公論新社、1999 年、前書きⅠ 頁。

“痛点”，实现了议席与影响力的双提升。反观自民党与公明党的执政联盟则遭遇重挫，参议院席位未及半数，在 2024 年 10 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席位同样未能过半。接连失利使其在参众两院均沦为少数派，此为自 1955 年自民党成立以来首次。随着 2025 年参议院选举落幕，日本政坛又浮现出右翼民粹的新潮流。批判既有政党且注重吸纳民众不满的参政党崛起。第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此次基本原地踏步，未能承担起作为主要反对党的角色，立宪民主党与自民党一样，也被贴上“旧政治=既成精英”的标签。民粹主义正悄然渗透，选民不再受所属组织或团体束缚的趋势也日益显著。^①

自民党在参议院失守后，石破茂曾多次表达留任意向，但党内要求其辞职、提前举行总裁选举的呼声日渐高涨。9 月 7 日，石破宣布为参议院选举失利负责，为避免党内分裂，决定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10 月 4 日，日本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成为该党首位女总裁。然而，日本公明党 10 月 10 日宣布退出与自民党的执政联盟，使高市的首相之路陡增变数，因此，尽快觅得新盟友便成为头等大事。10 月 20 日，自民党最终与日本维新会签署联合执政协议。经历此番政坛波折后，10 月 21 日，日本众参两院举行首相指名投票，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被指名为第 104 任首相。高市上台，凸显了日本保守政治的右倾化加剧与民粹化露头的叠加效应。

对于保守和民粹的问题，美国政治学者科里·罗宾在其《保守思想》一书中探讨了右派“反对什么”“保护什么”、对旧事物的再创造和对新事物的借鉴，以及如何将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融为一体等问题。^②而日本政治学者大井赤亥也曾先行探讨过小泉执政时期保守与民粹相遇这一问题，其后又在著作中认为，随着冷战的终结，长期以来占据战后政治基调的“保革对立”结构趋于瓦解。1993 年政界重组之后，日本政治显现出保守阵营不断膨胀之势，维持旧式保守政治的守旧派与追求变革的改革派这一新的政治对立轴开始出现。^③在东京大学教授宇野重规看来，创造日本内阁史上最长执政时间记录的安倍晋三首相的保守主义与战后日本的“保守本流”却“有很大不同，其修宪意图强烈”，也“毫不掩饰对左派和自由派的敌意”，因而，它是

^① 佐藤賢「日本の新たなポピュリズム 新自由主義から右派に」、『日本経済新聞』2025 年 7 月 22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CD1791Y0X10C25A7000000/>。

^② 参见科里·罗宾：《保守思想：从埃德蒙·伯克到唐纳德·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扶松茂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二版序言，第 4、5 页。

^③ 参见大井赤亥「改革保守とポピュリズムが出会った『小泉劇場』」、『論座』2019 年 10 月 31 日、<https://webronza.asahi.com/politics/articles/2019102800002.html>；大井赤亥『現代日本政治史－「改革の政治」とオルタナティヴ』、筑摩書房、2021 年。

更加对立性的保守，是可能分裂舆论的更具攻击性的保守。宇野进而认为，安倍长期执政不能仅仅归结为精心的政权运营和巧妙的选举策略，而是有其时代背景。只要“经济停滞和东亚国际关系紧张局面持续下去”，即使安倍首相下台，其做法也会被继承下去。^①

高市当选，源于其作为后安倍时代自民党内保守派核心人物的地位。她糅合了保守政治的右倾化与民粹主义，在渲染周边安全环境严峻氛围的背景下，她正在加速落实摆脱战败的目标。与此同时，物价高涨、养老困境、治安隐忧等问题加剧舆论不安，日本民众在政治生态劣化的情势下更倾向于支持立场保守乃至强硬的领导人。相较对手，其胜选另有三大关键因素：首先，政策纲领直击振兴经济、抑制通胀、税制改革、地方振兴等核心议题；其次，获得党内要员与地方势力鼎力支持，再叠加麻生太郎等派系领袖的强力背书，使其在自民党内部竞争中占据优势；再次，除小泉进次郎外，竞选对手普遍知名度不高且支持率分散，未能形成有效压制力量，最终在第二轮投票为其创造了决胜契机。高市问鼎首相之位，既得益于党内右派势力的稳固支撑，亦依托于其在社会舆论中积累的广泛人气。作为日本政界最早娴熟运用 Twitter、YouTube 等新媒体的国会议员之一，她通过频繁发布政策见解与生活动态，拉近了与年轻选民的距离。其社交媒体粉丝已逾百万，这股强大的网络影响力转化为现实政治资本，助其在党内角逐中最终胜出。

从舆论调查看，高市内阁不仅获得执政党支持者的支持，还吸纳了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的支持者。当前，高市内阁支持率为 74%，比此前石破内阁上台时的 51% 高出 23 个百分点，其支持率比 9 月对石破内阁实施的最后一次调查上升了 37 个百分点。^② 基于现行调查方式，与 2002 年以后上台的其他内阁相比，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与鸠山由纪夫内阁（75%）、菅义伟内阁（74%）处于同等水平。自民党支持者对内阁的支持率从 61% 升至 91%。此前支持自民党的保守派选民对石破政权不满，部分人转而支持在野党。以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支持者对石破内阁的支持率为一至二成左右，而在本次调查中，这一群体对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均超过了八成（见图-1）。

^① 宇野重規「戦後の『保守本流』と異なる安倍首相の保守主義が日本政治にもたらしたもの」、『論座』2020 年 9 月 7 日、<https://webronza.asahi.com/politics/articles/2020090500005.html>。

^② 《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达到 74%》，日经中文网，2025 年 10 月 27 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60278-2025-10-27-09-05-5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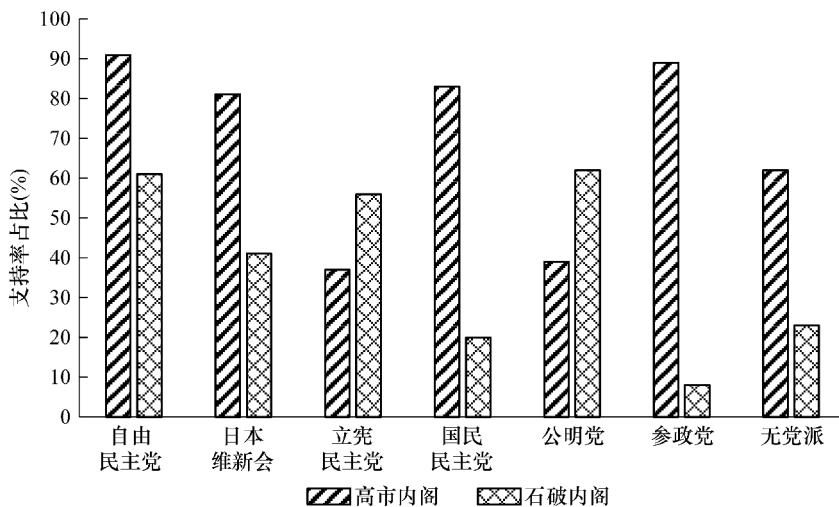


图-1 日本不同政党支持群体的内阁支持率

资料来源：《日本支持高市早苗的都是些什么人？》，日经中文网，2025年10月27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60281-2025-10-27-10-00-24.html>；日经世論調査「高市内閣、50代以下の8割支持 国民民主党や参政党も吸収」、「日本経済新聞」2025年10月27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47FX0U5A021C2000000>；日經世論調査「高市内閣7割超えも自民党支持率36% 石破政権より低い40代以上」、「日本経済新聞」2025年10月27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62050W5A021C2000000>。

二、高市政治倾向及其执政团队构成

高市早苗通往首相之路并非坦途，且极具戏剧性。若要追溯高市政权登顶的艰难历程，需回溯至石破政权下野的困境时期。石破的下野不仅是高市政权上台的先决条件，而且高市与石破还面临着诸多相似的挑战。另外，高市政权的建立是民粹势力、自民党内权力结构以及临时拼凑的执政伙伴共同作用的结果。依托前安倍派、麻生派、前茂木派所在的自民党“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本部”，堪称高市政权的“潜邸”，为其输送了骨干力量。以下本文将从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的政治信条、执政团队三个层面探讨高市政权的属性与特质。

（一）党内倒阁与石破下野

高市政权的登场，前提是石破政权遭遇党内倒阁风波，这也预示了高市政权亦将承接石破政权所面临的困境。

从选举政治的视角看，选举失利是自民党内发起“倒阁运动”的直接导

火索，石破茂领导的政权经历了三次挫败。第一次是在 2024 年众议院选举中失利，执政联盟未能获得半数议席。2024 年 9 月 27 日，石破茂当选为自民党总裁。上任不久，石破于 10 月 9 日解散众议院，试图借助石破与小泉组合的高人气，洗脱岸田文雄内阁时期所暴露的自民党黑金问题，为自民党开新局。然而事与愿违，石破领导下的自民党未能达成预期目标，自公联盟在选举中败北。自民党仅获得 191 席，公明党获得 24 席，总计 215 席，远低于国会过半数所需的 233 席，^① 而在野党则占据了 250 席。第二次是在 2025 年东京都地方议会选举中折戟。在 2025 年 6 月举行的东京都地方议会选举中，自公联盟又遭逢大败。自民党从 33 席跌至 21 席，公明党由 23 席跌至 19 席。^② 第三次是在 2025 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中败北。在 2025 年 7 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的席位从改选前的 141 席减至 122 席，未能达到半数所需的 125 席。由此，执政联盟在参众两院均沦为少数派，陷入朝小野大的窘境。在连续三次选举受挫后，自民党内出现了倒阁和换帅的呼声。尽管部分自民党和在野党的支持者仍力挺石破，甚至发起“石破不要辞职”的游行，^③ 但党内“倒石破”的声音却日益高涨。最终，为防止党内分裂态势进一步激化，在阁僚及党内“大佬”的力劝下，石破被迫辞职，随后，自民党方才启动了新总裁的竞选进程。

从自民党内权力结构的视角看，石破失势凸显了党内派阀力量的结构性制约。党内根基相对薄弱的石破，在实施“以小治大”策略时面临诸多阻碍，加之派阀间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其下野。石破本人已不再掌控独立派阀，这表明他在党内运作必须倚重与各大派系的协作，导致其个人主张难以有效贯彻。换言之，自民党的内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石破的角色。此外，石破与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关系不睦，因此，其也未能获得麻生派的支持。这一矛盾的根源可追溯至麻生内阁执政时期，石破曾积极推动“倒麻生”行动，自此，双方矛盾变得难以调和。当石破选举失利后，麻生抓住时机集结力量，推动了党内的“倒石破”风潮。

作为主帅的石破，面对选举失利固然难辞其咎，然而自民党本身所应承担的责任也不容忽视。该党在“政党形象”方面失去了民心，岸田内阁时期暴露的、以前安倍派议员为高发群体的“黑金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在石破执政期间，这一问题同样未能有效根除，导致自民党的负面形象难以洗

① 選挙ドットコム「第 50 回衆議院議員総選挙」、<https://shugiin.go2senkyo.com/50>。

② 選挙ドットコム「2025 東京都議会議員選挙」、<https://tokyo.go2senkyo.com/2025>。

③ 斎藤健・中北浩爾「結党から 70 年、自民党は再生できるか」、『中央公論』2025 年第 11 号、120—129 頁。

脱，支持率持续下滑。^① 随着高市当选总裁，自民党始终未能彻底根除金权政治的痼疾，这最终导致与其合作长达 26 年的公明党选择退出，标志着自公联盟时代的终结。

在石破执政期间，民粹主义势头渐起，形成了“建制派”与“草根层”之间的情绪对立，具体表现为选民对自民党建制派的反对声音日益强烈。长期执政的自民党逐渐与选民产生隔阂，导致选民对“建制派”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自民党参议院选举总结委员会报告指出，自民党败选的原因之一在于，选民普遍认为“党中央与国民之间出现了意识偏差，自民党未能充分关注国民生活议题”。^② “国民心中的闭塞感难以消除，对包括自民党在内的现行政党深感失望。”为此，选民纷纷转向支持以“日本优先”和“增加实际收入”为口号的参政党和国民民主党。^③ 这两党依靠网络动员，自称“代表草根势力”，带有明显的民粹色彩。若从意识形态光谱的角度审视，不难发现参政党和国民民主党本质上都是立场偏右的保守政党，从自民党的角度看，该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种内竞争”。通常情况下，自民党的主要争夺对象是中间派选民，其假想敌是立场略偏左的立宪民主党。^④ 然而，日本社会整体保守化现象加剧，政治右倾化愈发明显，自民党不得不与同属保守阵营的日本维新会、参政党、国民民主党等争夺保守派选民的支持。保守阵营内部的“种内竞争”促使自民党不断右转，迎合保守派民粹诉求，进而提升支持率。

在此背景下，自民党内的“极端保守派”向石破茂发起攻势，全力推举政治立场更为保守、迎合民粹情感诉求的高市上台。石破政权在党内派阀斗争、日本选民施压以及前安倍派黑金问题的多重冲击下，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二）高市的立场：迎合民粹的保守政治

相较于石破茂，高市早苗鲜明地展现出保守政治的右倾化倾向，其核心政治理念不仅涵盖极端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更兼有一定的国粹保守主义立场。此外，国粹保守的思想与日本当前的民粹主义诉求高度契合，成为高市上台的关键助推器。

^① 飯尾潤「人間関係を積み上げる政治活動の限界 自民党が直面する日本政治の地殻変動」、『中央公論』2025年第11号、130—137頁。

^② 自由民主党「第 27 回参議院議員通常選挙総括委員会報告書—『国民政党としての再生に向けて』—」、2025年9月2日、9頁、https://storage2.jimin.jp/pdf/news/information/211343_1.pdf。

^③ 同上，6頁。

^④ 飯尾潤「人間関係を積み上げる政治活動の限界 自民党が直面する日本政治の地殻変動」、『中央公論』2025年第11号、130—137頁。

1. 高市的从政经历

与出身显赫的安倍晋三不同，高市早苗 1961 年出生于日本奈良县一个工薪家庭。大学时就读于神户大学经营学部，喜欢骑摩托车从家到学校，大三时她曾独自一人用大约两周时间骑摩托车环游日本。毕业后进入由松下幸之助创办的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松下政经塾”，并通过该塾的安排赴美，担任众议员帕特·施罗德的“国会助手”（Congressional Fellow）。^① 1989 至 1990 年，高市短暂在朝日和富士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播。1993 年，高市以无党派身份当选众议员。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谷口尚子认为，初次当选后，高市早苗也曾与保守系自由派政治家共同活动，其强化保守色彩是在加入自民党之后。^② 在政治生涯中，高市曾先后加入自由党、自由改革联合与新进党，最终于 1996 年成为自民党的一员。在 2000 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她在“比例近畿区”参选并成功当选。2003 年，她从小选举区奈良一区出马竞选，但未能胜出。自 2005 年起，高市早苗转战奈良二区竞选众议院议员，并连续取得胜利。即便在 2009 年自民党遭遇大选失败、失去政权的逆境中，她依然通过比例复活的方式当选。

1998 年，在小渊内阁时期，高市被任命为“通商产业政务次官”。2002 年，在小泉内阁时期，她担任经济产业副大臣。2006 年，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高市首次入阁，担任负责“冲绳北方问题、科学技术、少子化、性别平等、食品安全、创新”等事项的特命担当大臣。2012 年，第二次安倍政权启动后，高市被任命为政调会长，政治地位逐步提升。2014 至 2017 年，以及随后的 2019 年，在第二次安倍改造内阁、第三次安倍内阁（及其两次改造内阁）以及第四次安倍再改造内阁时期，高市长期担任总务大臣一职，创下连任该职的最长时间纪录。^③ 2022 至 2024 年，高市还曾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

2021 年 9 月 3 日，日本首相菅义伟突然宣布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安倍表态全力支持高市竞选，^④ 尽管如此，高市仍在之后的总裁选举中败于岸田文雄。在 2024 年的总裁选举中，她又败于石破茂。当石破被迫下野后，

^① 横田一「高市早苗・元大臣に米国での経歴詐称疑惑再浮上——誤認による印象操作は明白」、『NetIB-News』2025年9月25日、<https://www.data-max.co.jp/article/80468>。

^② 「（交論）高市政権と政治の大変動 河野有理さん、谷口尚子さん」、『朝日新聞』2025年10月22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6328012.html>。

^③ 高市早苗「プロファイル」、<https://www.sanae.gr.jp/profile.html>。

^④ 「安倍前首相、高市氏支持を正式表明」、『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9月16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6BXW0W1A910C2000000/>。

高市再度参选，凭借麻生派、前茂木派及前安倍派的支持，击败呼声极高的小泉进次郎，最终当选自民党总裁，实现了她的从政目标。

在自民党内，高市积极参与多个政策领域的工作，并担任顾问、负责人等资深职务。高市曾历任自民党“经济安全对策本部”本部长、“乌克兰问题对策本部”代行本部长（执行本部长）、“入国管理政策等小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国土强韧化综合调查会”副会长等职。^①

此外，在2025年自民党政调会中，高市担任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本部”本部长代理一职。这一党内机构的设立，与安倍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密切相关。实际上，该机构汇聚了高市政权的众多核心成员：麻生太郎担任本部长（现任自民党副总裁），古屋圭司（现任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茂木敏充（现任外务大臣）出任该本部顾问。在高市本部长代理之下，萩生田光一（现任自民党干事长代行）、片山皋月（现任财务大臣）、有村治子（现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等担任副本部长。木原稔（现任内阁官房长官）出任该本部的干事长，小林鹰之（现任自民党政调会长）为该本部干事长代理，小野田纪美（现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则担任该本部副干事长。^②由此可见，高市政权的核心成员与自民党“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本部”成员高度重合。实际上，该本部发挥了“以外交为基轴、集结保守势力”的关键作用。^③

总体而言，高市的政治经历主要聚焦经济安全和产业政策，在外交与安全问题上则实现了对“安倍路线”^④的继承与拓展。

2. 高市的政治底色

高市早苗的基本政治立场较安倍更为右倾，在文化立场上则秉持文化保守主义与国粹主义。高市的政治底色明显带有“民粹煽动家”（demagogue）的色彩，她试图通过激发国民的安全焦虑来实现其政治图谋。

其一，高市早苗毫不掩饰其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她公开宣称，自己的座右铭为“高志向、宽视野、深心胸”，在个人主页上，她着重强调“国家观与信念”是其最珍视的核心价值。高市表示，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首位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与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正是她效仿与尊敬的典

① 高市早苗「プロファイル」、<https://www.sanae.gr.jp/profile.html>。

② 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2025年6月5日、16頁。

③ 「自民、外交強化へ麻生氏トップの戦略本部 保守結集『ポスト石破をにらんだ動き』か」、『産経新聞』2025年5月9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50509-USZOLHVLUNL6HSHY3S23JYGRQ/>。

④ 关于对“安倍路线”以及与此相对的“吉田路线”更详细的探讨，可参见张勇：《摆脱战败：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国内政治根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范。^① 高市在选举中就曾提及撒切尔，称自身“在强烈信念和执行力方面不会输”给她。^② 在既往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她更是反复使用“大和之国”这一极具民族色彩的词汇，^③ 以此煽起强烈共鸣——正如其宣扬“从心底热爱日本与日本人，从心底相信日本与日本人的潜力”，^④ 竭力塑造“纯化主义”爱国者的鲜明形象。^⑤ 她对外宣称，“作为一名坚信日本与日本人民蕴藏非凡潜力的人，我肩负开拓未来的使命，此刻正为此而战。”^⑥

其二，文化保守主义与国粹主义构成了高市政治底色的主要部分。在教育精神上，她坚持“精神复古主义”的主张，并由此引申出对修改“和平宪法”的执念。高市坚称，日本教育应以“道德心”与“自立”为核心教育目标，同时加大对传统文化、爱国情怀以及乡土情感的熏陶与培养力度。高市坚决主张应“设立有关家庭教育的规定”。^⑦ 通过对自立精神的强调，高市将“和平宪法”视为“缺乏自主性的宪法”，因此，呼吁加快对其进行修改。她还坚持尊皇复古主义论调，明确宣称要捍卫天皇权威与正统性的根基，即皇统。高市加入了“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并担任副会长，同时加入了极右组织“维护日本尊严与国家利益之会”。在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认识问题上，高市也长期持有严重的错误立场。高市妄称“向为国牺牲的英灵致以崇敬之念”，^⑧ 此番言论实则避重就轻，为参拜靖国神社寻找借口。在历史认知方面，高市杜撰“自卫战争”论调，^⑨ 曲解史实、故意混淆概念，其目的在于为日本开脱战争罪行。

其三，高市通过贩卖安全焦虑，树立卫国、强国形象，进而塑造自己坚持原则、绝不妥协的斗士形象，以迎合民粹主义。高市宣称“守护日本”为

① 高市早苗「プロファイル」、<https://www.sanae.gr.jp/profile.html>。

② 「保守回帰、地方からうねり『高市氏らしさ』前面、つかんだ党員票 自民党總裁選」、『朝日新聞』2025年10月5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6317006.html>。

③ 「高市早苗氏『奈良の女です。ヤマトの国で育ちました』演説会冒頭で」、『朝日新聞』2025年9月22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9Q1T6GT9QUTFK01DM.html>。

④ 高市早苗「自民党總裁選出馬記者会見 発言字幕」、2025年9月19日、<https://sosaisen-sanae.com/library>。

⑤ 内閣官房「内閣総理大臣談話」、2025年10月21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4/discourse/20251021danwa.html>。

⑥ 内閣官房「第219回国会における高市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5年10月24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4/statement/2025/1024shoshinhyomei.html>。

⑦ 高市早苗「基本理念」、<https://www.sanae.gr.jp/idea.html>。

⑧ 高市早苗「ご英靈への感謝と決意」、「コラム：5期目だ！野党だ！」永田町通信 平成21年10月～平成24年12月」、2012年8月15日、https://www.sanae.gr.jp/column_detail583.html。

⑨ 高市早苗「政府歴史見解は、早急に見直されるべきだと思う」、「コラム：大和の国から 平成15年11月～平成17年8月」、2005年4月28日、https://www.sanae.gr.jp/column_detail359.html。

其基本理念。^①在其公开出版的《迈向美丽、强大、成长的国家：我的“日本经济强韧化计划”》《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守护国家国民的黄金法则》《国力研究：让日本列岛强盛富裕》《守护日本 强盛富裕》等著作中，试图煽动受众的不安情绪，极力渲染所谓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②

总之，在日本社会已然形成“建制对草根”鲜明对立情绪的背景下，高市巧妙利用这一趋势，煽动安全焦虑，塑造出自身“坚守原则、绝不妥协”的斗士形象。尤有甚者，高市长久以来以极端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自居，这与日本民粹主义中的国粹倾向相契合，在石破主政期间，自民党就被批难以满足民粹呼声。在此背景下，高市趁机利用民粹情绪，将自己打造成保守右派和民粹代言人，最终登上自民党总裁之位。

（三）高市执政团队构成：党内运营、内阁人事与执政联盟

当选首相后，高市组建了核心团队，主要由党内高层、内阁成员以及临时组建的执政联盟（日本维新会）成员构成。本文将重点梳理高市团队成员的具体构成情况，并对这些成员的特征予以剖析。前文已提及，高市执政团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任用自民党“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本部”成员。这些成员不仅在数量上占据显著优势，更在关键岗位发挥重要作用，将其形容为高市政权的“潜邸”恰如其分。进一步来看，高市执政团队在整体上呈现出以下特性。

其一是派阀主导、论功行赏。无论是党内人事安排还是内阁人事布局，高市政权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派阀主导与论功行赏。在高市内阁中，麻生派与前茂木派成员身居要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本部”为高市政权输送了大量骨干力量，关键在于该组织汇聚了多位前安倍派、麻生派和前茂木派成员，此乃麻生以“外交战略”为旗号、集结保守势力的重要手段。正是得益于麻生太郎与茂木敏充的支持，高市才得以战胜小泉进次郎，攫取自民党总裁之位。再者，高市自身“以小治大”，在政权运作中必然需要麻生派与前茂木派力量的支持，因而着重任用两派成员。

麻生派在高市内阁中占据重要地位。麻生太郎再度出任自民党副总裁，其妻弟铃木俊一担任干事长，负责党内运营。在自民党“党四役”中，麻生派议员独占干事长、总务会长两大要职，因而，高市政权也被外界揶揄为

① 高市早苗「基本理念」，<https://www.sanae.gr.jp/idea.html>。

② 详见高市早苗「美しく、強く、成長する国へ。一私の『日本経済強靭化計画』一」、ワック、2021年；高市早苗「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国家国民を守る黄金律—」、飛鳥新社、2024年；高市早苗『国力研究—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一』、産経新聞出版、2024年；高市早苗『日本を守る 強く豊かに』、ワック、2024年。

“第二次麻生政权”。^① 在内阁人事安排中，麻生派议员赤间二郎出任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另外，前茂木派则占据六位阁僚，在数量上力拔头筹。茂木敏充本人再度出任外务大臣这一关键职位。作为高市政权“二把手”，内阁官房长官由前茂木派议员木原稔出任。此外，法务大臣、农林水产大臣、复兴大臣及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职位均由前茂木派人士占据。^②

高市任用前安倍派“黑金议员”也备受争议。为论功行赏，高市贸然起用了萩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代行。干事长代行是干事长的副手，位居党内“执行部”，而萩生田光一是“黑金议员”的典型代表，其秘书已被起诉。尽管如此，由于萩生田光一在总裁竞选中支持高市，高市便投桃报李，鲁莽地起用了这位“黑金担当大臣”。高市对“黑金担当大臣”的任用引发了原执政伙伴公明党以及在野党的强烈质疑。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表示“无法理解高市早苗为何任用黑金议员”。^③ 原执政伙伴公明党也因“金权政治”问题，毅然解除了与自民党的执政伙伴关系。

其二是注重团结竞争对手，强化党内协调。在民粹主义、“黑金问题”冲击下，自民党面临着有史以来较为严峻的内外环境。为保持全党团结，高市起用自己的竞选对手，试图弥合党内分歧，一致对外。其中，最大挑战者小泉进次郎被委任为防卫大臣，得票第三的林芳正被任命为总务大臣，而小林鹰之则出任政调会长一职。高市将挑战者都吸纳进党内或者阁内，客观上导致对手倒阁的难度增大，给其摆脱“一年一相”甚至是谋求长期执政埋下伏笔。

其三是注重与执政伙伴的协调。在长年执政伙伴公明党因“金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不和而退出执政联盟后，自民党经过一番紧急的“合纵连横”，最终成功拉拢日本维新会成为新的执政伙伴，然而，与自公联盟不同，自维联盟并非联合组阁，而是采取了“阁外合作”的模式。这就是说，日本维新会并未加入内阁，而是通过在首相指名选举时投票给高市，在重要法案上强化与自民党的协调，实际上是部分参与执政。作为两党联合的渠道，高市任命日本维新会“国会对策委员长”、原先出自自民党的远藤敬担任首相辅佐官，专门负责推进联合政府的政策协调。^④

① 「鈴木幹事長は4日前『内定』まるで『第2次麻生政権』派閥政治復活」、『毎日新聞』2025年10月7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51007/k00/00m/010/316000c>。

② 「【一覧】高市内閣 閣僚の顔ぶれは」、『NHK ONE』2025年10月21日、<https://news.web.nhk/newsweb/na/na-k10014954361000>。

③ 「裏金議員起用『理解できぬ』野田立民代表」、『時事通信』2025年10月6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5100600807&g=pol>。

④ 内閣官房「高市内閣 内閣総理大臣補佐官名簿」、2025年10月21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4/meibo/sourihosakan.html>。

其四是通过任命担当大臣和首相辅佐官来平衡党内派系，同时兑现竞选承诺。这尤其体现在“外国人”政策上。高市内阁首次设立负责外国人政策的“接纳外国人与实现有序共生社会担当大臣”，指定由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兼任这一职务。^①在高市内阁的“首相辅佐官”系列中，首次设立了“外国人政策担当”一职，由高市竞选总裁时的支持者松岛绿担任。此外，就首相辅佐官设置而言，另一值得关注的人事任命是，高市任命空军中将、前“航空自卫队补给本部长”尾上正定出任首相辅佐官，专门负责“国家安全保障重要政策、核军控、核不扩散问题”。^②自卫队将领出任首相辅佐官，实属非常规人事任命。其原因在于，首相辅佐官通常由执政党国会议员担任，而此次由军人出任这一重要职位，既显示出高市的鹰派立场、塑造了“国家守卫者”形象，又为高市及日本维新会或将对日本国策之一的“无核三原则”发起挑战，打下了人事布局的根基。

综上所述，高市政权的开局绝非一帆风顺。黑金问题、民粹主义及党内斗争，导致了石破政权的下台，高市政权则是在自民党党内分裂、民粹主义高涨的背景下诞生，同样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此外，高市当选亦是依靠党内保守势力、民粹主义的支持，况且其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本身亦具有较强的民粹主义立场。21世纪初，日本民粹主义表现相对平和，与欧美国家的激进行为有所不同，如在小泉纯一郎主政时期，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人气政治”。近年来，在国政层面，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势力迎合大众的工具，而在地方自治体层面，政客与右翼民粹主义的联动态势也有所加强。在高市早苗执政时期，日本民粹主义的排外性不断增强，这无疑需要加以警惕。在迎合与利用民粹之际，高市政权不应忘记哲人尼采的箴言——若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必将回以凝视。^③

客观来看，以民粹动员发迹的高市政权也面临战略选择。在既有的保守政治框架内，民粹已成为保守政治运作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要素。高市政权的上位，体现了保守政治对民粹思潮的回应与融合。可以说，保守政治不仅右倾化，也有了民粹化的迹象。不过，作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高市必须解决“安倍路线”如何吸收、利用并应对民粹主义这一重大课题。

^① 内閣官房「高市内閣 閣僚名簿」、2025年10月21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4/meibo/index.html>。

^② 内閣官房「高市内閣 内閣総理大臣補佐官名簿」、2025年10月21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4/meibo/sourihosakan.html>。

^③ 尼采：《善恶的彼岸》，魏育青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

三、“安倍路线”、民粹主义与日本政局： 高市施政的结构性限制

高市的支持阵营，包括民粹势力、派阀势力以及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这些力量直接影响着高市政权的施政进程。高市依靠这些势力扶植上台，自然要对这些力量负责。在参选自民党总裁之际，高市早苗试图以安倍晋三的延续者与承袭者形象示人，重申安倍提出的“日本归来”（Japan is back）口号，^①“安倍路线”显然是高市政权计划继承的大战略。此外，高市早苗能够在自民党候选人中崭露头角，原因还在于其有意扮演新时期日本民粹主义代言人的角色，也就是说，高市政权极力把民粹主义诉求打扮为“高市特色”。如此一来，高市政权必然面临战略路线、国内政局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复合博弈与制衡，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协调日本战略路线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和回应民粹诉求。简单来说，“安倍路线”、民粹诉求及国内政局左右着高市政权的施政方向。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有必要先回顾并概括植根于保守思想的“安倍路线”，进而剖析日本民粹主义的倾向。

（一）“安倍路线”：日本的大战略

“安倍路线”，亦称“安倍大战略”（Abe grand strategy），^②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创设，并在岸田文雄执政时期得以发展的、有别于既有“吉田路线”的日本大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学者、小布什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迈克尔·格林，将“安倍大战略”与山县有朋的“利益线”概念作了类比，着重强调安倍将日本定位为海洋国家，系统整合了理念、同盟、投资与外交等要素，从而构建起“安倍大战略”。^③

“安倍路线”以海洋国家作为根本定位，“将利益线决定性地擘画在海洋上”，并设定了三大战略目标：维护与推广“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保障日

① 「週明け自民党総裁選告示へ 高市氏“JAPAN is back”掲げ『野党との連立』にも意欲 小泉氏は陣営発足式で決意表明…河野前デジタル相が支持表明」、「TBSテレビ」2025年9月20日、<https://newsdig.tbs.co.jp/articles/-/2180801>。

② Christopher W. Hughes, Alessio Patalano and Robert Ward, “Japan’s Grand Strategy: The Abe Era and Its Aftermath,”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63, No. 1, 2021, pp. 125-160.

③ Michael J. Green, *Line of Advantage: Japan’s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Abe Shinzo*,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11-12.

本领土与国民的生命、人身和财产安全，推动经济发展以及维护自由贸易体制。^①“安倍大战略”将中国确定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即视中国为日本战略目标的威胁者与挑战者。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一方面，安倍内阁与岸田内阁通过修改宪法解释，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日本在特定条件下行使武力，从而增强了国内军事力量并提升了同盟的威慑力，为强化对华威慑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安倍以日美同盟为战略支撑，^②还强化以排他性小多边主义路径构建的“印太秩序”，试图通过塑造中国外部环境，间接促使中国遵循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即实施规则引导策略。同时，在进行威慑与规则引导之外，其也保留对华接触层面的战术调整弹性与灵活空间，加强危机管理与冲突化解工作，致力于实现双边战略稳定。

由此可见，“安倍路线”与此前的“吉田路线”在目标和手段方面均存在差异。在“吉田路线”指引下，日本将海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作为首要战略目标，并将其置于最高优先级，在军事安全领域则保持低调态势。而“安倍路线”的战略目标兼顾经济与军事，将安全置于最高优先级，同时重新激活了日本蛰伏多年的“利益线”思维。

在探讨“安倍路线”及“安倍大战略”的内容与演变后，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安倍大战略”的政治理念：其根植于日本保守主义，体现了日本保守主义与战略思维的深度融合。安倍晋三不仅是日本的保守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强硬的民族主义者。^③

首先，追求大国地位是“安倍大战略”的核心信条。安倍晋三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强调，“日本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二流国家。”^④迈向大国外交是日本保守主义者的核心诉求。^⑤其次，在保守主义者安倍晋三的政治底色中，国粹主义占据重要地位。长州藩地域文化、岸信介与安倍晋太郎的家世遗传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安倍复古的国家观。^⑥安倍晋三在历史认知和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了国粹主义立场，通过参拜靖国神社来表达对历史

^① 内閣官房「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22年12月16日、5頁、<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

^② 参见黄大慧、孟繁超：《战略锚定与战术调整：“特朗普冲击”与日美同盟“一体化”》，《外交评论》，2025年第4期，第27—50页。

^③ 参见ケビン・M・ドーク、「安倍晋三と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今後どうなるのかー」、富山泰訳、『国基研紀要』第2号、2021年、30—48頁、https://jinf.jp/pdf/memoirs/jinfjournal_20210916/kevin_m_dook.pdf。

^④ Shinzo Abe, “Japan Is Bac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ebruary 22, 2013, https://www.mofa.go.jp/announce/pm/abe/us_20130222en.html.

^⑤ 加藤博章「ナショナリズムと自衛隊」、『国際政治』2012年第170号、30—45頁。

^⑥ 张勇：《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第105—131页。

的特定解读和态度，包括美化文化传统、开脱战争罪行、回避战后反思，力图复兴文化保守意义上的所谓“美丽的日本”。再次，“安倍大战略”是对保守主义进行战略性驾驭。自视为“保守主义者”的安倍晋三的政治信条是做“战斗型政治家”，其对立面是“不战型政治家”。他认为所谓“战斗型政治家”，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国民而敢作敢为、不畏指责。而“不战型政治家”，就是其虽然赞同你的说法，但也不敢大胆表达出来而成为众矢之的。^①安倍晋三既是异质化的“保守主义者”，也是“务实主义者”，且具备一定的战略思维。他的大战略建立在国粹主义和追求大国地位的基础之上。当极端政治理念与现实利益需求发生冲突时，以安倍为代表的战略派能有效管控和驾驭民粹，利用民粹而非随波逐流、一味迎合。

高市与安倍关系密切，被视为“安倍路线”的坚定继承人。在安倍晋三漫长的首相任期中，她几度出任重要职位。安倍曾多次称高市为“保守派之星”，高市也曾被外界贴上“女版安倍”的标签。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高市表示要“继承”安倍遗志，此举获得了一部分保守派的支持。高市的政治理念包括做安倍提出的“战斗型政治家”、延续“安倍经济学”等，然而，依靠保守与民粹力量发迹的高市早苗是否具有必要的平衡感和统筹能力，特别是前者并不容乐观。事实上，在高市登场之际，日本民粹主义愈发盛行，迫使保守政党自民党向民粹主义妥协，推出了煽动型政客高市并最终胜出，这实则也暗含了保守民粹势力对“安倍路线”所谓“平衡性”的冲击。

（二）保守政治的民粹化

日本社会的保守主义内在包含一定的民粹主义元素。随着日本民粹势力兴起，保守势力日益向民粹妥协，高市执政便是保守主义民粹化的典型例证，因此，有必要聚焦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就日本语境而言，保守主义与民粹的关系更为复杂。

第一，日本保守主义内部包含着民粹主义要素。日本保守主义以“战后”价值观为反题，融合了对日本传统的执念、对欧美价值观的抗拒，以及国际冷战背景下对苏联阵营的敌对，形成了“亲美与反美”的复合体。^②进入 21 世纪后，政治右倾化与社会右倾化加速演进，^③保守主义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日本保守主义内部大致可分为两类，即自由保守主义和国粹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与西方保守主义一脉相承，基于承认理性存在不完

^①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06 年、3—5 頁。

^② 米原谦：《战后日本政治思潮与保守主义》，熊淑娥译，《日本文论》，2023 年第 2 期，第 24—42 页。

^③ 王广涛：《从政治右倾化到社会右倾化——日本右倾化发展动向研究》，《日本学刊》，2023 年第 3 期，第 75—92 页。

美、摒弃抽象思维的假定，其“保守”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思考模式。而国粹保守主义则专注于“日本特性”，即执着于保护日本传统，将维护“日本特性”作为首要思考方式。^①因此，这两派保守者在历史问题、战争罪行以及“和平宪法”等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究其根源，国粹保守主义者思考问题的起点和归宿是在坚持“日本特性”的基础上，找回历史上那个富国强兵的日本，而这正是保守主义的异化。国粹保守因其预设立场，实际上背离了真正的保守思维模式，相反，国粹保守与颇具煽动性、情绪性的民粹主义不谋而合。

第二，国粹保守与日本民粹主义不期而遇。尽管民粹主义的定义纷繁复杂，各国表现形态各异，但其核心特征可归纳如下：在政治信条方面，民粹主义坚持“草根道德论”、传统优越论以及复古主义国家观；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本国优先，甚至带有排外主义倾向，抵制全球化，笃信非黑即白的善恶对立叙事；而对内政事务而言，民粹主义则期望由“代表草根的强人”执政，不排斥果断地使用武力。然而，究其本质，民粹主义政策主张缺乏系统性，且忽视了政策与战略的可行性。这就是说，民粹主义诉求以偏执的意识形态为原则，反对妥协，而建制派基于理性的调整往往被视为徒有虚名的保守主义。对民粹主义者而言，最紧要的是应坚决保持意识形态导向的纯粹性。^②有鉴于此，民粹政客常利用民粹主义的空洞化和情绪化特点来迎合大众心理。^③

“日本特性”是国粹保守主义的核心关注点，也是其力图保护的核心对象，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立场实质上蕴含了民粹主义的元素，契合了民粹主义者“偏执、愤怒、绝对化”的情感诉求。^④就主张的内容而言，既然“日本特性”被视为首要保护目标，那么“日本优先”“日本传统优越”以及“日本体制优秀”论便成为逻辑上的必然延伸。在情绪动员方面，国粹保守主义满足了民粹意识形态对纯洁性的追求，同时也迎合了民粹主义偏执、不妥协、反建制的情绪倾向。日本民粹主义披着国粹主义的外衣显现，进一步助长了排外主义、反建制主义及复古主义的国家观念。早稻田大学教授田

^① 安井伸介：《自由保守与国粹保守：现代日本保守主义的两种面向》，《问题与研究》，2022年第2期，第93—128页。

^② 参见陶文钊：《新政以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演变（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74—577页。

^③ 参见阎学通：《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第III—VI页；张建立：《21世纪日本民粹主义的特点》，《东北亚学刊》，2022年第3期，第38—51页；王广涛：《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25年第1期，第114—126页；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36—51页。

^④ 陶文钊：《新政以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演变（下）》，第583页。茶党运动的特点对研究日本国内的民粹主义亦有借鉴之处。

边俊介将“国粹型民族主义”概括为以下三点特征：其一，纯化主义，即强调“日本特性”的纯粹性；其二，爱国主义，即宣扬对日本的自豪感；其三，严重的排外主义。^①从这一思想脉络出发，日本国粹保守主义将自由保守视为异端，将其归为“非保守”，并与自由阵营对立。国粹保守主义将“日本特性”视为“国之大者”，这与自由保守所倡导的理性不完美与务实主义思考方式存在冲突。

在国粹保守主义者眼中，“日本特性”被视为至高无上、完美无瑕的，他们无法容忍自由保守派对“日本特性”的任何质疑。与自由保守主义相比，国粹保守主义展现出更为强烈的不宽容和反建制倾向，与民粹主义高度契合，两者极易合流。由此可以再次看出，国粹保守与真正的保守主义思维模式泾渭分明，国粹保守实际上背离了自由保守的核心信条，因此，国粹保守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一种异化，同时，这也从侧面揭示出日本政治的衰败与退化。

第三，国粹保守与民粹主义的合流迫使自由保守派下台，进而助推高市上台。自称“保守政治家”的石破茂，被视为稳健保守派代表。石破所强调的保守，侧重于保守的思考方式以及对不完美的反思。然而，在历史反思等议题上，自认为自由保守的石破却屡遭民粹主义的牵制和攻讦，例如，日本右翼组织“日本会议”明确反对石破茂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石破谈话”。该组织对反省历史的强烈抵触与高市的态度如出一辙，二者均否认战争责任与侵略行为，拒绝反思，并美化所谓的“日本特性”。^②

第四，民粹主义对“安倍路线”亦有冲击。尽管“安倍路线”根植于保守主义立场，契合民粹主义对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及强化军事力量的诉求，但民粹主义在对华接触、管控历史问题方面对其存在抵触情绪。民粹主义者未能理解战略稳定与战略平衡的重要性，主张对华政策应全面以武力为后盾实施威慑。此外，民粹主义者站在肯定“日本特性”的立场上，漠视中、韩等国的立场，反对将靖国神社问题及反思历史罪行视为外交问题。在其看来，无需在这些问题上过度考量双边关系，日本的国家叙事不应受他国影响。从战略视角看，“安倍路线”呈现出保守主义特征，尽管其中包含国粹主义元素，但其对战略目标的追求要优先于情绪诉求。在安倍的大战略框架内，通过一定程度的对华接触及管控历史问题，进而实现对双边关系的有

^① 田辺俊介「本当に高揚するのか？継続調査で見えたナショナリズムの4類型」、『中央公論』2025年第11号、104—111頁。

^② 谷口智彦「8月15日終戦記念日の首相式辞について」、『谷口智彦会長コーナー』2025年8月7日、<https://www.nipponkaigi.org/opinion/archives/19260>。

效管理，被视为战略实施的必然要求。正因如此，民粹主义对“安倍路线”抱有一定的不满情绪。

值得警惕的是，一方面，高市是民粹的煽动者，注重根据执政需要塑造民意；另一方面，一些保守偏右的声音也在鼓噪高市政权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若高市未能充分满足民粹群体的情绪诉求，即未能彰显“高市特色”，她很可能面临支持者的“惩罚”，因此，高市及其团队也承受着观众成本带来的压力考验。

（三）内政压力：党内根基、执政联盟与国会运营

高市的执政基础主要有几大依托：其一是民粹主义的支持。其二是麻生派阀的强力支持。特别是在麻生太郎的调度下，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迅速达成协议，为高市提供了政治上的补充力量。其三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战略合作。尽管双方合作过程中存在一些苛刻条件，但最终为高市的首相之路铺平了道路。然而，这也使高市政权在运营过程中，除需解决如何有效驾驭民粹、坚持“安倍路线”这一战略路线问题外，还面临诸多难题。

首先，在党内运营上，高市面临如何平衡“麻生-茂木特色”与自身特色的挑战。这与石破政权遭遇的困境相似，高市政权运行首先要解决党内运营问题。一方面，高市获得民粹势力支持，在于其毫不掩饰的国粹主义与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立场契合了民粹派诉求。简言之，民粹派支持高市，源于高市所展现的“高市特色”。另一方面，在实际执政过程中，作为无派阀力量依托的总裁，高市又必须依赖麻生派和前茂木派的支持。如此一来，“高市特色”或许会被“麻生特色”或“茂木特色”遮蔽，其结果便是，民粹力量对高市的期待会迅速降低，高市政权或将陷入支持率低迷的窘境。

其次，在执政联盟运营上，如何与临时组建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加强协调也具有不确定性。与长期合作且制度化运营的自公联盟不同，自维联盟的临时性特征更为显著，主要以利益为导向。在联合方式上，日本维新会没有选择与自民党直接组建联合内阁，而是采取“阁外合作”模式，甚至被称为“准联合执政”，其以此策略为退出联盟保留了政策退路。同时，日本维新会借助“阁外合作”和“退出联盟”等手段，保留对高市政权的惩罚措施，迫使高市不得不回应其政策偏好。在政策偏好上，日本维新会推动的“众议院议员削减一成”和“政治资金规制”等议题，直接触及自民党乃至日本所有政党的切身利益。如何平衡自民党党内要求与执政伙伴诉求，将成为高市政权面临的一大难题。另外，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合作也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在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执政时期，针对自民党在政策推行过程中的“踩油门”行为，公明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踩刹车”的角色。立宪民

主党党首野田佳彦则把自维联盟称作“双油门”政权。^①

再次，在国会运营上，面对“朝小野大”的局面，能否有效推进政策与立法不容乐观。自维联盟未能彻底改变高市政权的窘境。在众议院，自维联盟拥有 231 席，距离过半数（233 席）仍有微弱差距。而在参议院，自维联盟的议席数为 120 席，与过半数（124 席）尚差四席。这表明，在预算审批与法案通过过程中，自民党仍需依赖另一在野党的支持，方可顺利立法或兑现政策承诺。

概言之，尽管高市内阁拥有较高人气，但未来执政仍充满挑战。高市的支持基础涵盖民粹势力、自民党派阀力量以及日本维新会三大板块，这就要求高市在民粹诉求、派阀利益与执政伙伴需求之间达成不稳定的平衡，同时还需兼顾在野党的利益诉求。在此背景下，“高市特色”可能会逐渐弱化，进而削弱民粹势力对其的情感支持。与此同时，“安倍路线”作为日本的大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调和民粹与战略视角间的矛盾。高市既是“安倍路线”的继承者，亦在根据个人偏好和新的形势对这一路线进行调整，然而，民粹主义对“安倍路线”也构成一定冲击。未来，如何有效调和民粹诉求与“安倍路线”间的关系，将成为高市政权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高市政权对美外交及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安倍路线”与“高市特色”共同决定了高市政权的施政方向，即在总体上继承“安倍路线”的前提下，高市政权在开展对美外交及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时，也带有明显的高市本人特质及其所处的时代特征。即便“美国优先”与“日本优先”时有摩擦，日本仍将日美同盟视为战略之锚。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高市政权对美与对华政策严重失衡。

（一）协调“美国优先”与“日本优先”

对高市政权而言，最紧迫且关键的课题是持续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强化与美国的合作。高市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基石，对于日美两国所面临的课题，将扎实开展协作，提升日美同盟的威慑力与应对力。^②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理念情况下，如何与逐渐背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原则的美国打交道，将成为日本面临的重大难题。目前，

^① 「（社説）首相初の論戦 衆議重視 問われる実践」、『朝日新聞』2025年11月5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6337583.html>。

^② 参见首相官邸「第219回国会における高市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5年10月24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4/statement/2025/1024shoshinhyomei.html>。

日本国际关系学界认为世界秩序已进入多极化时代，鉴于美国对盟友的承诺能力日益下降，仅仅依靠日美同盟愈发变得难以应对变局，因此，日本格外重视与价值观相同的所谓“志同道合”伙伴的合作，高市因而提出日本应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深化日美韩、日美菲、日美澳印等小多边安全对话。^①

日本认为，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美国，严重偏离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该秩序最重要的创建者、维护者及倡导者，美国正不断削弱、修改甚至动摇这一秩序。”换言之，“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已经跨越了卢比孔河。”^②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玉置敦彦也指出，随着“美国优先”呼声的高涨，“美国治下的和平正走向终结。”^③ 在日方看来，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策略，背离了同盟体系与多边主义的外交原则。在同盟体系层面，特朗普政府忽视美国与盟友间的价值观纽带，转而专注于计算同盟的相对收益，引发了盟友的恐慌情绪。一方面，特朗普对日美同盟、北约等盟友承担的义务表现出不满，^④ 加剧了盟友“被抛弃的恐惧”，影响了美国兑现承诺的可信度；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一味要求盟友增加军费，^⑤ 迫使盟友承担更多责任，企图减轻美国的负担，转嫁部分责任。

在国际组织层面，特朗普政府忽视且贬低国际组织的作用。上任之初，特朗普便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审查美国对国际组织的资助问题，并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⑥ 此外，特朗普还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⑦ 特朗普推行的“退出外交”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① 参见首相官邸「第219回国会における高市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5年10月24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4/statement/2025/1024shoshinhyomei.html>。

② 参见佐々木卓也「第2期トランプ政権の始動」、『国際問題』2025年第724号、4頁。

③ 玉置敦彦「パックスアメリカーナの終焉と中国」、鹿島平和研究所安全保障外交政策研究会、2025年9月、http://www.kiip.or.jp/taskforce/doc/anzen202509_NTamaki.pdf。

④ NHK ONE ニュース「トランプ氏『日本は米を守る必要ない』日米安全保障条約に不満」、2025年3月7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50307/k10014742081000.html>。

⑤ エルブリッジ・コルビー、『アジア・ファースト新・アメリカの軍事戦略ー』、奥山真司訳、文藝春秋、2024年、197頁。

⑥ “Withdraw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nd Ending Funding to Certain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and Reviewing United States Support to Al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withdrawing-the-united-states-from-and-ending-funding-to-certain-united-nations-organizations-and-reviewing-united-states-support-to-all-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⑦ 足立菜摘・藤谷和広・後藤一也「米国のWHO脱退、世界への影響は日本の分担金負担も増加?」、『朝日新聞』2025年1月21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1P0V3YT1PUTFL008M.html>；「米トランプ政権、ユネスコに脱退を通知『SDGsに過度に注力』」、『朝日新聞』2025年7月28日、<https://www.asahi.com/sdgs/article/15923278>。

削弱了其软实力，令盟友对美方的价值观产生怀疑。

第二，“特朗普 2.0”成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显著跃进的象征。随着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在国际社会产生扩散、示范和外溢效应，日本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也受到刺激。特朗普政府迎合并利用美国右翼民粹，使其部分主张获得合法性，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社会保守主义等理念，对原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①声势日益浩大。

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为日本带来了示范和刺激效应。一方面，旧有禁忌被打破。许多日本民粹主义者认为，既然美国能堂而皇之地宣称“美国优先”，日本自然也有权理直气壮地宣布“日本优先”。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冲破了日本社会的禁忌，促使日本也开始推行“日本优先”的理念。另一方面，厌恶损失的心态开始作祟。在日本民粹主义者看来，既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已不再信奉该秩序，日本也应放弃，转而谋求单边利益。若不坚持“日本优先”，则可能被“美国优先”政策所利用。

概言之，日本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本体性危机。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通过单边主义手段重构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的关系，导致了战略收缩、同盟体系信任度下降以及国内治理张力显性化，这些变化使得美国日渐背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日本看来，这一秩序正遭遇本体性危机。此外，“美国优先”为“日本优先”施加了结构压力与示范效应，助推了民粹主义的扩散，激发了日本的民粹情绪。换言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倾向，特别是其民粹主义特征，正在动摇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可能塑造一种新的基于民粹主义的国际秩序蓝图。在西方各国均固守本国利益优先理念的大背景下，如何调和“日本优先”与“美国优先”，成为高市政权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积极卷入中美战略竞争

除了调和“美国优先”与“日本优先”外，日本面临的另一重大课题是中美战略竞争。中美战略竞争不仅是当下国际秩序变革的核心，更是推动这一变革的关键力量。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沿地带，日本不仅深受其影响，更是这场战略竞争的重要关注者与关键参与者。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日本在权衡自身利益后，选择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积极巩固日美同盟关系，以提升同盟威慑力，并加快构建印太地区网状安全架构。在高市执政期间，挑战“无核三原则”及宪法第九条、加强情报机制建设、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等举措，将成为其政权的标志性

^① Michael C. Williams, “The Crisis of the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1, Issue 3, 2025, pp. 947-965.

政策。

第一，从日本对外战略层面来看，锚定日美同盟不仅是日本对外战略的核心原则，^①更是日本战略界普遍认同的主流理念。这一点在 2022 年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战略强调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来提升日本的威慑力和改善地区安全环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指出，“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战略的基石”，“日美同盟对于日本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②即便在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的情况下，日美同盟依旧被视为日本安全战略的“定海神针”。

2025 年 10 月 1 日，高市在接受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书面采访时，表达了支持深化日美关系的强烈意愿。首先，高市认为日美同盟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日美两国需进一步深化同盟关系，加速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以此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推动共同繁荣。其次，高市特别强调，“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是日美同盟的核心要素”，日美双方应“加快提升同盟威慑力和应对能力”。^③再次，面对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倾向，日本仍应强化日美关系，扩大其影响力。正如高市所言，日本应“以日美同盟为核心，扩展并形成网状的区域安全保障机制”。^④

此外，“无核三原则”与“核共享”成为推进日本安全战略及日美同盟的突破点与关注焦点。日本认为，日美双方将中国视为所谓战略挑战后，如何运用核及常规力量对中国实施威慑，就成为该同盟的核心议题。鉴于此，日本战略派开始挑战日本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这一国策，力图动摇其中的“不运进”条款，以实现美日“核共享”。

高市素来对“无核三原则”抱有不满。在 2022 年 4 月 11 日，她挑战了“不运进”原则，认为有必要对这一原则进行讨论，甚至将其与“人民生命”相对立。她认为，“尽管美国向日本提供延伸威慑，但若日本固守不运进原则，美国的核威慑将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日本“应重新审视不运进

^① 黄大慧、孟繁超：《战略锚定与战术调整：“特朗普冲击”与日美同盟“一体化”》，第 27—50 页。

^② 内閣官房『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22 年 12 月 16 日、6、12 頁、<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

^③ Riley Walters and Iku Tsujihiro, “LDP Leadership Election: Candidates Discuss the Future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Hudson Institute, October 1, 2025, <https://www.hudson.org/politics-government/ldp-leadership-election-candidates-discuss-future-japanese-foreign-policy-iku-tsujihiro-riley-walters>.

^④ *Ibid.*

原则，更加注重风险最小化”。^① 在 2024 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再次强调延伸威慑与“无核三原则”之间存在矛盾。^② 2025 年 9 月 19 日，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选集会上，高市表示日本正处于全球独一无二的“核武器最前沿”状态，^③ 意图煽动安全焦虑，力图突破“无核三原则”。她进一步提出，要强化日美同盟在核威慑及核常一体化威慑中的可信度，以对中国形成足够的威慑力。

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迅速推行了打破传统的人事任命，如提拔前“航空自卫队补给本部长”尾上正定担任首相辅佐官，负责国家安全政策及核扩散相关事务。尾上与其他自卫队将领曾联名撰文提议，日本应“在日美首脑峰会上探讨核问题，借此深入了解美国核保护伞的实际运作方式，以及美国在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和使用方面的具体策略”。^④

第二，安全战略锚定日美同盟，亦是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核心主张。石破执政时期的选举失利使得自民党在参众两院均未赢得过半席位，执政伙伴公明党退出联盟，又使高市早苗近乎陷入绝境，在此背景下，高市紧急拉拢日本维新会加入联合阵营。至少在目前，倘若失去日本维新会的支持，高市政权会捉襟见肘，这意味着日本维新会将在执政联盟中发挥着“关键少数”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梳理日本维新会在日本安全战略上的主张。

一言以蔽之，日本维新会亦是“安倍路线”的拥趸。首先，该党认同“安倍路线”所提出的海洋国家身份定位。其政纲“维新八策”是对日本海洋国家战略先驱坂本龙马《船中八策》的致敬之作。其次，日本维新会积极支持强化并拓展日美同盟，同时呼应安倍晋三提出的日美“核共享”倡议。2025 年 9 月，该党发布的《21 世纪的国防构想与宪法改正》宣称，日本应组建海洋国家联盟，缔结日美澳菲正式的军事同盟，即“四海同盟”。^⑤《维新八策 2025》强调：“面对日益复杂的东亚安全局势，日本应以日美同盟为基石，加强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盟伴的合作，构建海洋网络伙伴关系。”同时，“通过共享核潜艇、参与美国核延伸威慑决策机制等举措，

^① 高市早苗「日本の国防①：守るべきは『国民の皆様の命』か『非核三原則』か？」、「コラム：9期目の永田町から 令和3年11月～」、2022年4月11日、https://www.sanae.gr.jp/column_detail1386.html。

^② 長崎大学核兵器廃絶研究センター「自民党総裁選 核政策を巡る議論を危惧する」、2024年9月20日、<https://www.recna.nagasaki-u.ac.jp/recna/eyes/no29-jp>。

^③ 高市早苗「自民党総裁選出馬記者会見 発言字幕」、2025年9月19日、<https://sosaisen-sanae.com/library>。

^④ 岩田清文など『自衛隊最高幹部が語る令和の国防』、新潮社、2021年、263頁。

^⑤ 日本維新の会「21世紀の国防構想と憲法改正」、2025年9月18日、29頁、<https://oishin.jp/news/2025/images/ee68a34e12dd4646aaf12ae5d43919692202c174.pdf>。

进一步巩固日美同盟。”^① 参与美国延伸威慑决策机制，实则意味着谋求日美“核共享”。

安倍晋三曾称“日本应参与美国的延伸威慑决策”，这一立场暗含着修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的意图。^② 安倍政府通过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加强经济外交以及军事外交等手段，力图在平时和战时均展示延伸威慑的可信度，以此强化对华威慑力。实际上，日本维新会的“核共享”论调与安倍的观点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在安全问题上，主要在野党与自民党基调近似，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进一步，更加重视推进日美同盟的延伸威慑。公明党虽历来坚守“无核三原则”等立场，然而，随着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自民党将寻求与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等开展政策合作。未来，高市政权会加速推进基于武力威慑的安全战略，作为执政伙伴的日本维新会，尤其可能会在价值观外交以及突破“无核三原则”方面扮演助推者的角色。

第三，高市政权加速推进军事化扩张、图谋军事大国地位。高市在就任首相后的“所信表明演说”中提出，将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并在2026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以强化日本的防卫体系。首先，随着公明党“踩刹车”角色的消失，加之日本维新会的助推，高市甫一上任便急于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强化对华敌对态势，^③ 并启动新一轮扩军经武。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执政协议指出，一方面要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则要求提升防区外打击能力，即在强化陆上长程打击能力的同时，加快推进舰载垂直发射系统及潜水艇建设。^④ 换言之，日本旨在构建涵盖陆地、水面舰艇及潜艇的多层次打击系统，以威慑和胁迫中国。其次，强化情报机制成为高市执政时期自维联盟的核心政策。自维联盟执政协议宣称，在2026年通常国会期间，将全面建设“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局长”体系，以与现行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家安全保障局-国家安全保障局长”体系一一对应。到2027年，日本将设立独立的对外情报部门，

^① 日本维新之会「维新八策 2025 個別政策集」、2025年、34頁、https://o-ishin.jp/policy/pdf/ishin_8saku2025.pdf。

^② 安倍晋三「『核共有』の議論から逃げるな」、『文藝春秋』2022年第5号、106—114頁、<https://bunshun.jp/bungeishunju/articles/h3462>。

^③ 小沢慶太「安保政策『足かせ』外れ推進へ 自维政権、3文書改定を前倒し 装備移転も緩和」、『産経新聞』2025年10月21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51021-NVCXDTT77RPyRLPNLDPYYCVQL4>。

^④ 日本维新之会「自由民主党・日本维新之会 連立政権合意書」、2025年10月20日、5頁、<https://o-ishin.jp/news/2025/images/624de5f22900f6e88e892abb49d3fc70ef3cac92.pdf>。

以进一步强化情报搜集和整合能力。^①

此外，自维联盟将持续推动对宪法第九条的修订。该条款承诺不保有战争力量与放弃交战权，故被称为“和平宪法”。然而，自维两党均对此表示不满。自维联盟执政协议明示，双方以日本维新会的《21 世纪的国防构想与宪法改正》为蓝本，设立“两党关于宪法修订的条文起草委员会”，并宣布将于 2025 年临时国会期间完成设置。^② 日本维新会还提出要“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项，力争使日本全面行使集体自卫权”，其理由是日本维新会认为“第九条与国际法及安全环境存在偏差”。^③

总而言之，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日本将继续坚定其战略上依附于美国的立场。高市政权的上台以及自维联盟的形成，将进一步加速美日针对中国的武力威慑布局。一方面，高市及其执政团队将继承“安倍路线”，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另一方面，其将继续依托“安倍大战略”框架，以“海洋国家”定位为导向，力图通过“日美同盟+”模式构建印太地区网状安全架构。高市执政期间，日本预计将加快与同盟及准同盟盟友间的防务合作进程，并推动与准同盟盟友在军事装备开发与采购领域的合作。高市本人、其所代表的民粹势力以及日本维新会，均对“无核三原则”持不满态度，过去也曾对该原则发起过挑战。日本维新会更可能会推波助澜，不排除实质性修改“无核三原则”，进而接受日美“核共享”方案的可能性。高市政权亦将强化情报收集功能、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及修订“安保三文件”作为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发力点，会迅速推动一系列具有“高市特色”和“自维联盟特色”政策的落地。

五、失衡的对华外交：排外主义苗头与涉台错误言行

在中日关系方面，秉持本国优越论与排外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潮将为两国关系带来新的挑战。高市政权不仅在历史认识、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对双边关系造成冲击，同时，排外主义势力的抬头也引发了在日中国公民安全保护^④

① 日本維新の会「自由民主党・日本維新の会 連立政権合意書」、6 頁。

② 同上，4 頁。

③ 日本維新の会「21 世紀の国防構想と憲法改正」、2025 年 9 月 18 日、12—16 頁、<https://oishin.jp/news/2025/images/ee68a34e12dd4646aafl2ae5d43919692202c174.pdf>。

④ 在日语语境中，更多使用“人的安全（人の安全）”这一概念，为便于理解，此处改用公民安全。

和遏制仇恨犯罪的新课题。高市上台引发了对中日关系稳定性的担忧，尤其是她强硬的“抗中”“亲台”立场，以及她可能采取的对华强硬政策，都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鉴于其人格特质及所处环境，高市的言行将不断冲击甚至是触碰中日关系的红线。其错误立场若不加调整，可能直接动摇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同时，若高市在“无核三原则”问题上冒进，也会给双边关系及地区安全带来严峻挑战。此外，民粹主义对外交接触的曲解，冲击了以“威慑+接触”为核心理念的“安倍路线”，势必为中日关系增添新的阻碍。

（一）日本排外主义苗头与在日中国公民安全保障

在外国人政策等方面，展现强硬姿态的保守派高市之所以能获得支持，其背景是自民党内因保守支持层离去而高涨的危机感。^①按照日本的逻辑，战略派遵循“安倍路线”、将中国视为战略挑战，这被认为是基于日本安全战略视角的判断。然而，民粹化转向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反华情绪，为日本政府改善中日关系带来了更大的观众成本和国内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海外公民利益保护与遏制仇恨犯罪等成为近年新兴的课题。当保守势力遭遇民粹思潮，从两方面释放了日本对华负面情绪。

第一，不断从负面角度解读中国，以构建“日本优越论”。民粹化的保守主义以国粹的形式表现出来，本质上是宣扬“日本特性”和“日本优越性”。随着中日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日本“经济大国”的身份认同难以维系，而其政治大国化的目标也尚未完成。鉴于此，日本通过负面解读中国的对外行动，试图构建“成熟对不成熟”“文明对非文明”的反差认知，^②以此巩固其虚幻的优越感。

致力于打造所谓日本“优越形象”的高市政权，在历史认识与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上面临挑战。一方面，高市面临着极右势力就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认识问题施加的巨大压力。高市决定放弃在2025年“秋日例大祭”期间参拜靖国神社后，右翼团体“维护日本尊严与国家利益之会”的代表、自民党参议员青山繁晴公开宣称“高市迟早会参拜靖国神社”。^③另一方面，参拜靖国神社和篡改历史的行为将严重损害中日、日韩关系。情感诉求与现实政治

^① 「保守回帰、地方からうねり『高市氏らしさ』前面、つかんだ党員票 自民党総裁選」、『朝日新聞』2025年10月5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6317006.html>。

^② Linus Hagström, “The ‘Abnormal’ State: Identity, Norm/Exception and Japa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No. 1, 2014, pp. 122-145.

^③ 「高市総裁の靖国参拝見送りに理解、青山繁晴氏『いざれどこかで。今回無理しないのは当然』」、『産経新聞』2025年10月8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51008-CJS2E6UG3RHXVLYBE6X2HDBK2M/>。

的双重挑战，正考验着高市政权的外交能力。

第二，民粹化保守主义蕴含反全球化倾向，其最显著特征表现为排外主义。例如，日本参政党公然打出“日本优先”旗号，主张严格管控外国居民。高市在竞选演讲中，猛烈抨击外国游客惊扰奈良之鹿，煽动排外情绪，其言论已显露出“仇恨演说”的特质。^① 根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数据，长期旅居日本的外国人（包括在留卡持有者和特别永住者）中，人数最多的为中国籍（873286 人），远超排名第二的越南籍（634361 人）和第三的韩国籍（409238 人）。^② 当日本民粹主义开始排斥、限制外国人时，其矛头便公然指向了中国。

当日本保守政治转向迎合民粹思潮时，中日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在日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特别是高市和日本参政党刻意迎合、煽动民粹排外情绪，恐将助长仇恨犯罪。此外，以国粹主义和排外主义为底色的民粹化保守势力上台后，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社会的厌华、排华声音，使得中日关系改善面临更高的国内政治成本。安倍执政时期，尽管在某些时期对华政策转向强硬，但整体上仍强调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然而，民粹主义情绪化的特点可能导致高市政权拒绝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民意基础的削弱或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形成较大制约。

在总裁选举中，高市提出“没有保护国民免受外国势力侵害的法律是让人困扰的”，主张制定保护国家重要信息的《防止间谍法》，此举将会进一步助长日本的排外风潮。这一动议过去曾因可能侵害思想自由而成为废案，但高市在其担任负责人的自民党内调查会上主导了相关政策研讨。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参政党也正在展开讨论，朝野协商或将启动。^③ 11 月 13 日，高市称“希望探讨保护日本免受外国势力影响的对策”，强调“包括针对外国势力渗透和窃取情报在内，政府将对扰乱日本社会稳定、损害民主主义的各种风险进行应对”。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中也写入将尽快建立情报与反间谍相关法制。国民民主与参政两党也认为《防止间

^① 「『シカ発言』で公開質問状 自民・高市氏に奈良の市民団体『ヘイトスピーチの可能性』指摘」、『産経新聞』2025年9月29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50929-ERLVOTATOFJWJCDQ3IPWGIIKI/>。

^② 法務省「令和6年末現在における在留外国人について」、https://www.moj.go.jp/isa/publications/press/13_00052.html。

^③ 太田成美「高市氏『シカ』発言の先にある狙い『タカ』派が向き合うアジア外交」、『朝日新聞』2025年10月5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B444FVTB4ULFA005M.html>。

谍法》不可或缺。^①

高市接下来推动的是外国人政策的严格化。她在演讲中表示，“每年把与我们在文化等各方面都差异巨大的人们成批接纳进来的政策必须重新考虑”，呼吁严肃对待非法滞留问题，主张扩充负责调查、取缔等工作的人员。在总裁选举中，她还表示，“对于以经济目的伪装成难民前来的人要请他们回去”，“要对外国人购买土地建筑物制定严格规则。”^②

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写明，将在 2026 年的例行国会期间制定对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取得土地加强管制的法案。高市在“所信表明演说”中提到部分外国人的违法行为，强调政府将坚决加以应对。高市 11 月 4 日在首相官邸首次召开“接纳外国人与实现有序共生社会的相关阁僚会议”，旨在加强政府的“指挥塔”功能，力争在 2026 年 1 月制定出综合应对措施。新政府拟讨论修改外国人取得土地的规则，将税款及社保欠缴等信息用于在留资格审查。此外，在劳动力短缺等背景下如何接纳持续增加的外国人、“过度旅游”对策、收紧外国驾照换发手续也将成为议题。高市在会上指出，“部分外国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国民感到不安和不公平。”^③

（二）高市涉台错误言行严重冲击中日关系

高市早苗在涉台问题上的极端错误言行正在严重冲击日本对华政策。日本民粹化的右派政客以中国为对手，突出“日本特性”。在这种背景下，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行就格外引人关注和担忧。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宣称，“台湾有事”或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现职领导人发表涉台挑衅言论，公然开历史倒车，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④ 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受到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评。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也是台湾光复 80 周年。其“涉台言论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对此，“日本应当深刻反省历

^① 以上引文参见《高市表示有意制定反间谍法 摸索实现日朝会谈》，共同社，2025 年 11 月 14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5/11/04c023e492e8--.html>。

^② 「保守回帰、地方からうねり『高市氏らしさ』前面、つかんだ党員票 自民党総裁選」、『朝日新聞』2025 年 10 月 5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6317006.html>。

^③ 《详讯：日本相关阁僚首次开会讨论修改外国人政策》，共同社，2025 年 11 月 5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5/11/075bd80c3274.html>。

^④ 《王毅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5 年 11 月 27 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511/t20251127_11761926.shtml。

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① 高市延续了安倍晋三“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论调，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试图武力威胁邻国，无疑将对中日关系产生严重消极影响。安倍执政时期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曾这样阐述所谓“台湾有事”引发“日本有事”的逻辑：其一，“台湾有事”与钓鱼岛有事联动；其二，日本离岛距台湾岛仅 110 公里；其三，美军援台必动用日本基地，从而令在日美军基地沦为打击目标。^② 兼原论调暴露了日本牵强附会、颠倒黑白的荒谬逻辑，企图将干涉主义粉饰为“被动自卫”，这也凸显了“主权线、利益线”的扩张思维在日本战略中依然根深蒂固。具体而言，在涉台问题上，高市政权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高市长期秉持亲台立场。高市多次与中国台湾地区要员会晤，甚至曾窜台。2024 年 12 月 10 日，高市在日本与时任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会面，明确表示“特别喜欢台湾”，并强调自己重视对台联络。^③ 2025 年 4 月 27 至 29 日，高市在窜访期间分别会见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及前领导人蔡英文。高市主张应加强日台双方在防务、供应链安全、人员及情报交流方面的合作，重点围绕经济安全、防务安全与价值观外交三大领域展开合作。^④ 高市当选自民党总裁后，赖清德赞誉其为“台湾坚定的友人”。9 月 19 日，高市于竞选大会上，竟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⑤ 10 月 10 日，高市通过日台交流渠道“日华恳”，向赖清德递交亲笔信。10 月 13 日，高市再次发表错误言论，妄称“对日本而言，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保持紧密经济和人员往来的极为重要的伙伴，也是重要的友人”。^⑥ 更有甚者，作为首相的高市于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高调炒作，连续发布两

^① 《毛宁：日本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5 年 11 月 28 日，https://www.mfa.gov.cn/web/sp_683685/wjbfyrlxjzh_683691/202511/t20251128_11762667.shtml。

^② Nobukatsu Kanehara, “Grand Plans : A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How to Implement an Indo-Pacific Strategy,” *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 Vol. 47, Issue 3, 2022, pp. 20-25.

^③ 奥原慎平「『もう台湾が大好きで大好きで』自民・高市氏 民進党・秘書長も「日本は友達超えて家族」」、「産経新聞」2024 年 12 月 11 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41211-2IZKS453UVGFPJXUQZWVHLSGP/>。

^④ 「高市氏、日台協力訴え 賴総統と連携強化確認一台北」、「時事通信」2025 年 4 月 28 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5042801021&g=int#goog_rewarded。

^⑤ 高市早苗 総裁選特設サイト「9 月 19 日 高市早苗 自民党総裁戦出馬記者会見 記者質疑応答」、2025 年 9 月 19 日、<https://sosaisen-sanae.com/library>。

^⑥ 原田達矢「『台湾は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高市氏が総裁就任祝いに謝意」、「朝日新聞」2025 年 10 月 13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BF332WTBFUTFK00CM.html>。

条 APEC 会议期间与中国台湾地区当局人员会面的消息。^① 其行为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②

其次，高市重用亲台派人士担任要职。高市重用“日华恳”会长古屋圭司，任命其为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古屋在担任该职务后，于 10 月以参加庆典为由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并与赖清德会晤，强调“日台间存在着坚韧的信任关系，共同秉持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③ 高市还启用“日华恳”事务局长、前防卫大臣木原稔出任内阁官房长官。10 月 14 日，木原稔声称“日台半导体合作将增强对华威慑力”，并妄称“台湾有事或将直接引发日本有事”。^④ 此外，资深亲台派“大佬”麻生太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麻生也曾在 2023 年 8 月窜台并表示“准备战斗”。^⑤ 在 2024 年访问美国期间，他表示台湾海峡的局势动荡极有可能导致日本面临“存亡危机事态”，^⑥ 并暗示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2025 年 9 月 25 日，时值自民党总裁选战正酣，麻生再度会见中国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麻生表示，“无论是谁当选自民党总裁，日台关系都会继续稳固强化。”^⑦

最后，高市政权以对华武力威慑甚至是威胁作为政策主基调，其在“无核三原则”上的立场与台湾问题紧密相关。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修改，特别是她关于修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的提议，将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根本性冲击。高市早苗正在探讨伴随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相关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进行更改，其理由是“不运进”核武器的概念有可能减弱美国核威慑力的实效性。她担忧如果遵守“不运进”原则，那么，就无法允许美军载核舰船停靠日本，在发生“突发事态”之际，美国的

① 「高市首相が台湾代表と会談 APEC 開催の韓国で 中国側は抗議」、『朝日新聞』2025 年 11 月 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C13C2DTC1ULFA006M.html>。

② 参见《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领导人 APEC 会议期间涉台错误言行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5 年 11 月 1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fryrgth_676844/202511/t20251101_11745456.shtml。

③ 楊明珠・楊堯茹「日華懇議員団が台湾訪問 国慶日式典出席で 古屋会長、自民党総裁から総統への親書に言及」、『フォーカス台湾』2025 年 10 月 9 日、<https://japan.focustaiwan.tw/politics/202510090001>。

④ 戴雅真「木原前防衛相、半導体の日台協力は『中国への抑止力に』東京でシンポジウム/台湾」、『フォーカス台湾』2025 年 10 月 15 日、<https://japan.focustaiwan.tw/politics/202510150004>。

⑤ 白見はる菜・石田耕一郎「麻生氏『戦う覚悟』発言が波紋 蔡政権は歓迎の一方、『観光客が…』」、『朝日新聞』2023 年 8 月 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R887364R83UTFK014.html>。

⑥ 中田絢子「『台湾有事は日本の存立危機事態』麻生氏 米国で抑止力強化訴え」、『朝日新聞』2024 年 1 月 1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S1C56K6S1CUTFK004.html>。

⑦ 「自民・麻生氏、台湾立法院長と面会『新総裁でも関係さらに強固』」、『日本経済新聞』2025 年 9 月 25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599H0V20C25A9000000>。

核威慑便会减弱。自民党于 11 月 20 日上午召开了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计划 2026 年 4 月汇总建议，预计在 2026 年年底前完成修改。如果实现修改，则是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又一重大变更。^① 高市及其执政团队此举居心叵测，着眼点之一就是紧盯台湾问题，企图以核威慑干涉中国内政。日本的这一荒谬逻辑，如高市政权任命的负责安全保障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尾上正定、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山崎幸二以及前海上幕僚长武居智久等将领所称的那样，是计划废止“不运进”原则，试图将其替换为“不被打击”（do not let the opponent strike Japan by nuclear weapons）。与此同时，为在所谓“台湾有事”时确保美国的核威慑能力，他们建议，日本未来应允许美军新开发的搭载海基核巡航导弹的潜艇停靠港口，并要求针对在日本部署美军战区级核武器展开研究。^② 高市的人事安排以及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在核问题上的偏好，揭示了高市政权或将加速推进这一进程。

结语

高市早苗之所以能被选为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是以石破茂下野为前提条件的。民粹力量、自民党内权力结构以及联合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正塑造着这个成立不久的新政权。高市将民粹因素纳入“高市特色”，甘愿充当民粹主义的代理人，展现出日本右倾化的保守政治迎合与利用民粹的明显倾向。“安倍路线”作为日本战略界的主流共识，也成为高市政权的底色，深刻形塑其执政方向。高市面临党内“以小治大”与国会“朝小野大”的困境，如何调和“高市特色”与“麻生-茂木特色”之间的差异，将成为高市执政的重要课题。随着在民粹与安全问题上起到“踩刹车”作用的公明党影响力减弱，以及日本维新会的推波助澜，高市政权在右倾化、民粹化、泛安全化等方面的立场将加速显现。在剧变的时代，外交议题日益多元复杂，决策失误易引发连锁反应。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外交的失衡愈发明显。长此以往，其不仅危及自身稳定与繁荣，也会给东亚地区和平与发展招来祸端。

^① 《独家：日本首相高市探讨修改无核三原则》，共同社，2025 年 11 月 15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5/11/011bf661159b.html>；《自民党着手讨论修改安保战略 明年 4 月汇总建议》，共同社，2025 年 11 月 20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5/11/c4c2d75f29d5--4.html>。

^② 笹川平和财团 安全保障・日米グループ、「日米同盟における拡大抑止の実効性向上を目指して—『核の傘』を本物に—」、2025 年 6 月 2 日、2—5 頁、https://www.spf.org/global-image/units/upfiles/592196-1-20250530142537_b68394151b0cd0.pdf。

在外交政策方面，自维联盟将继续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延续并强化在印太的战略布局，推动日美同盟在该地区进一步拓展影响力。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失衡加剧之势。高市政权加紧战略性利用美国，将中国定位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断挑衅，并可能更频繁地采取政治承诺与政策实践相分离的策略，将经济安全纳入对华战略框架内，以制衡中国。因此，自维联盟将提前修订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强化情报体系，继续挑战“宪法第九条”，谋取大国地位，图谋武力威慑中国。在中日关系上，民粹主义的兴起加剧了排外主义倾向，除了参拜靖国神社及错误历史认识等传统问题外，还催生出在日中国公民安全保护这一新课题。高市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日关系底线，有关言行“极其错误、极为危险，性质影响极其恶劣”。^①高市及其领导的自维联盟和幕僚团队还试图对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无核三原则”进行调整，考虑将“不运进”核武器改为所谓的“不被打击”，以强化与美国的“核共享”机制，图谋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崇尚实力的高市政权倘若在“凝视”深渊中走上歧途，将对中日关系及东亚地区安全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在日本战败 80 周年这一标志性年份，一个曾因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招致国家覆亡的战败国，正在扩军备战并以武力威胁邻国。人们不禁要问，其究竟意欲何为？“如果日本想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背弃和平发展承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中国人民不会答应，国际社会不会允许，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②值此风高浪急之时，《波茨坦公告》第四条向日本发出的警示依然振聋发聩，“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③对于高市早苗政权未来走向，国际社会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责任编辑：徐然）

^① 《中国代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就高市涉华错误言行阐明立场》，新华网，2025 年 11 月 22 日，<https://www3.xinhuanet.com/20251122/6cf08c7eaf86446e88659f31095eccaf/c.html>。

^② 《外交部：如果日本想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新华网，2025 年 11 月 21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1121/e25db87e86914a8b884d68369ab27cd7/c.html>。

^③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2 页。

and the capability to provide supplementary public good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fairer and more equitabl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rough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nd other Chinese solutions.

Key words: “withdrawal diplomacy”, institutional hegemony,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When Conservatism Encounters Populism: The Impact of Takaichi and Imbalance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ZHANG Yong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urging populist undercurrents, the rise to power of Sanae Takaichi, regarded as the “female Shinzo Abe” and a “conservative hardliner”, signals the accelerated rightward shift of Japanese conservative politics. Populist forces, the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ruling coalition partner, the Japan Innovation Party (Nippon Ishin no Kai), 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 While the Takaichi government’s right-leaning tendenc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also seeks to harness the momentum of populism, with the impact of such efforts already emerging. Following the departure of Komeito,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acted as a “brake” on radical policies,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led by Takaichi and the Japan Innovation Party have formed a “dual-accelerator” coalition government. Under the premise of continuing the “Abe Line”, Japan’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will demonstrate distinct “Takaichi characteristics”. Despite occasional frictions between the “America First” and “Japan First” priorities, Japan still regards the Japan-U.S. Alliance as its strategic anchor. Furthermore, amid the context of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Takaichi administration’s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fallen into a state of severe imbalance. Takaichi and her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team will continue to hollow out and even revise 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 advance the revision of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even attempt to challenge the “Three Non-Nuclear Principles” in pursuit of realizing Japan-U.S. “nuclear sharing”. These moves aim to expedi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into a “war-capable nation” and substantially enhance deterrence against China. In terms of China-Japan

relations, populism-driven xenophobic sentiments have given rise to “national security” as a new diplomatic imperative. Takaichi has linked the so-called “Taiwan contingency” to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collective self-defense, grossly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endange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er erroneous remarks and reckless actions regarding Taiwan are extremely irresponsible and dangerous, pos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China-Japan relations and regional peace.

Key words: Sanae Takaichi, the “Abe Line”, populism, Japan-U.S. alliance, China-Japan relations

“America First” Endures: The Public Roots of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FU Shu

Abstract: The rise of American populism, particularly the right-wing populist surge exemplified by Donald Trump, has reshaped the landscape of U. S.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elineating the core tenets of American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and its public opinion basis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U.S. diplomacy. Theoretically, the “America First” agenda can be conceptualized along three dimensions: *anti-multilateralism* in the political domain, *anti-globalism* in the economic domain, and *anti-value-based diplomacy* in the cultural domain. Empirically, this study draws on two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s: the 2020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 and the 2022 Survey by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CCGA). By adopting cross-survey imputation and matching methods, it identifi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Americans’ sense of crisi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populist foreign polic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olitical populist tendencie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isolationism, contempt for allies, and opposi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conomic populist tendencies notably increase support for tariffs; and cultural populist tendencies reinforce rejection of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multicultural values. The evidence demonstrat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s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is no coincidence. Endowed with extensive 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foundations, it emerges as a spillover effect of domestic political distrust,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cultural anxiety. This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is likely to exert a long-term impact on U.S. foreign